

# 元明之間三國故事對「南蠻」的 想像與作用

謝予騰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提 要

「孟獲」人物、「南蠻」民族，是元代以後的三國故事中不同於「漢」族的代表性「異族」；雖說孟獲在史料中可見其存在，但與《三國志平話》、《三國志通俗演義》情節中的人物與族群形象，實則有著明顯的差異。

對於「異族」的想像，是一個民族建構自我認同與異族重要的區別方式，而「華夷之辨」也是自先秦以來，中國思想重要的課題之一，這樣的概念尤其在多次被外族入侵、統治後的漢人文化裡，愈發受到各個不同社會階級的重視。

本文透過觀察、分析三國故事在元、明兩代之間對於「異族」的差異，對比明代設置之「土司」形象，討論不同時代的創作者和受眾如何接受與想像「民族」此一概念的視角，也能探索不同時代之元素，被結合到故事情節中所產生的效果與作用。

**關鍵詞：**三國 孟獲 南蠻 異族 土司

# 元明之間三國故事對「南蠻」的 想像與作用

謝予騰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一、前言：非我族類

自古以來，民族、族群間的區別與認同，一直是中華文化中重要的思辯主題之一，如《論語·憲問》中孔子「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sup>①</sup>的說法，《左傳·成公四年》中提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sup>②</sup>或《荀子·正論》中「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sup>③</sup>之論述等等，目的都是爲了要以「民族」爲基礎，<sup>④</sup>來區分所自我認同的「華夏」、「漢」與「異族」，也可以視爲是一種民

---

① （南宋）朱熹：《四書集註》（臺南：大孚書局，1991年），頁98。

②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頁818。

③ （先秦）荀卿著，（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頁220。

④ 哈洛德·伊薩克（Harold R. Issacs）：「民族是由哪些東西組成的，每個人都可以列出一份自己的清單。隨便舉個一兩項，我稱之為基本群體認同要素的東西一定是跑不掉的，總不外共同的文化、歷史、傳統、語言、宗教，有的還加上『種族』，以及領土、政治、經濟，所有這些東西各以不同的份量組成一個實體，就是所謂的『民族』。」，見（美）哈洛德·伊薩克（Harold R. Issacs）著，鄧伯宸譯：《族群》（北縣：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9年），頁258-259。

族性的自我認同與「他者（The Other）」之辨。<sup>⑤</sup>

「三國」這個在東亞文化圈中具有高度影響力、述說了自東漢末年到西晉初期，中國內、外部不同勢力、英雄之間對抗的龐大敘事，<sup>⑥</sup>也受到了這個觀念的影響，到了元、明之際的三國故事裡，仍存在諸多與外族交流、戰爭的情節中，尤其以蜀漢丞相諸葛亮與「蠻王」孟獲間的「七擒七縱」故事為代表之一。<sup>⑦</sup>

然而，不同由歷代貴族、朝廷官員與知識份子們所書寫而成的思想、歷史論敘與記錄，三國故事在時間長河裡，是由不同時代和跨領域的文人、創作者，<sup>⑧</sup>以及廣大的三國故事受眾們，所共同完成的作品，至於元、明兩代，更最主要是透過一群以三國故事編撰為生的說書人、編劇家和小說家，以及說書聽眾、戲曲觀眾和由識字的中產階級、讀書人和批評家所構成的讀者群，共同生成的文學藝

---

⑤ 「東方不只是與歐陸毗鄰，它也是歐洲最大且最富足、最古老的殖民地，是其文明及語言的來源，它的文化競爭著，以及其最深、最常一再出現的『異己』（the Other）意象。除此之外，東方作為一個相對照的意象、理念、人格與經驗，也幫助了對歐洲（或西方）的自我界定與示明。」其中，「東方」亦為「The Other」的其中一種翻譯；而透過「東方」、「異己」、「異族」這些概念為鏡象來對照，一個民族往往才能在差異中找到「自我」。見（美）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頁2。

⑥ 三國故事的影響遍及整個東亞世界，流傳與影響地區除了中國之外，還包括日本列島、朝鮮半島、台灣、越南、緬甸等中南半島國家，此外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影響層面涵蓋宗教信仰、政治思想、文學作品，乃至於當今的影視作品和電玩遊戲中，都仍可以看到大量的三國故事元素。

⑦ 「歷史上確有『七擒孟獲』之事，但《三國志·蜀書·後主傳》、〈諸葛亮傳〉等史籍所載卻甚為簡略。裴松之注《諸葛亮傳》，引《漢晉春秋》所記則較為具體。這段記載，第一次出現了『七縱七擒』（『禽』通『擒』）的說法，而且有了孟獲心服口服，表示『不復反』的舉動。儘管它沒有敘述『七縱七擒』的過程，卻為後人提供了廣闊的想像空間。羅貫中正是在此基礎上揮灑才情，創造出了這一色彩斑斕的名篇。」。見沈伯俊：《賞味三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354。

⑧ 「除了屬於正統的史籍經典之外，小說也從半正半野歷史文獻、稗官外史，甚至民間流傳的歷史故事中汲取材料。它們包括各種資料，從裴松之為《三國志》所作的評注（它本身也大量採自《英雄記》和《曹瞞傳》等偽史書）到流行的味史韻文，如胡曾和周靜軒（周禮）的《詠史詩》，也有來自楊慎的《彈詞》體詩集之痕跡。」。（美）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370。

術作品。<sup>9</sup>

在這樣的故事生成背景之下，對於「南蠻」、「蠻王」等人物、角色與族群的史料考究，並非當代受眾所在意之處，反而是透過這樣「異國」、「異族」色彩的情節，來與相對於「漢族」的「異族」想像——尤其從元代蒙古人的統治脫離之後，明政權高舉的民族主義，<sup>10</sup> 也在這樣的情況下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同時，三國故事的受眾大多在市井之中，對於當代的朝政並不容易有全面性的瞭解，等於政府、政治的運作本身，就帶有一定程度的神秘性，讓無法參與的人民產生一定程度的好奇與吸引力；而三國故事中，諸葛亮的人物形象，是一個被神化的偉大治理者，<sup>11</sup> 而身為「蠻王」的孟獲，其實是蜀漢附屬國的領導者，這也就和明代負責管理「異地土著」的「土司」一職的形象重疊，<sup>12</sup> 透過諸葛亮在三國故事中代表中原、中華文化，率兵討伐反叛的孟獲，等於也是對民族自信提升的一種宣傳手段；同時，「土司」本身在明代就帶有一定程度的異國色彩，

---

<sup>9</sup> 關四平認為，三國故事的傳播有「文本閱讀」、「戲曲形式」、「說唱形式」三種主要途徑，關氏指出：「頗多有閱讀能力的人，既是讀者又是聽眾，或是先閱讀文本後看戲聽說唱，或是先聽故事引起興趣而後尋書來讀。這種傳播方式多樣化與接受群體的多元化、交叉性、廣泛性的相互作用，更典型地體現了馬克斯生產與消費的基本原理……在漫長的《三國志演義》傳播史中，讀者與聽眾、讀者與再創作者互相包容、轉換，每一次再創作與改編，都會留下新的空白點和未定點，由新的接受者透過自己的創造去填補，使《三國志演義》本來就十分豐富的包含著『集體無意識』的內涵愈加豐厚，潛在地在某種程度上支配著人們的思想活動方式，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見關四平：《三國演義源流研究 下編：傳播研究》（臺北：龍視界出版社，2014年），頁13-14。

<sup>10</sup>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的口號之一，便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明）宋濂：〈諭中原檄〉，收於（明）程敏政編：《皇明文衡》（上海：商務印書館，1967年）卷之1，頁1。

<sup>11</sup> 符麗平：「羅貫中在創作小說《三國演義》時，以歷史人物諸葛亮為原型，充分借鑒歷朝歷代對諸葛亮形象塑造有益成分，並積極發揮自己天才般創造力，虛構有關故事情節，他筆下的諸葛亮形象是帝王師，智慧、忠貞、充滿悲劇性，又帶有道士的影子，暗含了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畢生追求的人生價值觀，成為千百年來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典範。」，見符麗平：《從三國史到《三國演義》》（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年），頁35。

<sup>12</sup> 包遵彭：「到明代，踵元故事，分別置司、府、州、縣，額以賦役，聽我驅調，西南夷來歸者，即用原官安置。其土官銜號有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及長官司。悉以土酋為之，故名土司。」，見余貽澤等著：《明代土司制度》（臺北：學生書局，1968年），頁1。

對於尋求新鮮感的創作者和受眾而言，在南蠻人物身上，也展現了對邊境「土司」的想像。

在過去針對南蠻的研究中，主要可以分成幾個方向，第一是針對孟獲個人的史料、族群等角度切入，分析孟獲或諸葛亮等人的歷史、人物或地方俗文學中的形象與流傳，如江玉祥的〈論彝族民間傳說和故事中的孟獲形象〉<sup>13</sup>、林繼富與黃紫壇的〈諸葛亮傳說的記憶譜系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基於西南視角〉<sup>14</sup>、劉方旭的〈民俗文化與民間記憶——重讀孟獲〉<sup>15</sup>以及傅光宇的〈諸葛亮南征傳說及其在緬甸的流播〉<sup>16</sup>等皆屬此類；第二是對於三國史料或故事中「七擒七縱」情節的改編、演變或不同視域下的解讀進行分析與討論，如王志強的〈蜀漢正統視域下的諸葛亮七擒孟獲〉<sup>17</sup>、吳依凡的〈真實與虛構：「諸葛亮南征南中」由《三國志》到《三國演義》承衍研究〉<sup>18</sup>、黃郁庭的〈蜀漢滅亡原因新探——以民族政策與地域衝突為中心〉<sup>19</sup>、符麗平的〈《三國演義》「七擒孟獲」情節源流考〉<sup>20</sup>和劉海燕的〈《三國志演義》「七擒孟獲」故事的文本演

- 
- <sup>13</sup> 江玉祥：〈論彝族民間傳說和故事中的孟獲形象〉，《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1卷（2000年8月），頁62-67。（DOI：10.6231/CME.2003(14)01）
- <sup>14</sup> 林繼富、黃紫壇：〈諸葛亮傳說的記憶譜系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基於西南視角〉，《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第17卷第5期（2005年5月），頁13-25、153。（DOI：10.62662/lljy0104001）
- <sup>15</sup> 劉方旭：〈民俗文化與民間記憶——重讀孟獲〉，《興義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2013年10月），頁36-39。（DOI：10.7044/JNHCTC.200406.0486）
- <sup>16</sup> 傅光宇：〈諸葛亮南征傳說及其在緬甸的流播〉，《民俗藝術研究》1995年第5期（1995年10月），頁16-24。（DOI：10.30382/SSA.202102\_(166).0002）
- <sup>17</sup> 王志強：〈蜀漢正統視域下的諸葛亮七擒孟獲〉，《史壇縱論》2023年第5期（2023年9月），頁52-56。（DOI：10.29458/AGSCLSU.201207.0021）
- <sup>18</sup> 吳依凡：〈真實與虛構：「諸葛亮南征南中」由《三國志》到《三國演義》承衍研究〉，《輔大中研所學刊》第21期（2009年4月），頁67-88。（DOI：10.29444/JGICLDFJCU.200904.0004）
- <sup>19</sup> 黃郁庭：〈蜀漢滅亡原因新探——以民族政策與地域衝突為中心〉，《東吳歷史學報》第32期（2014年12月），頁65-114。（DOI：10.29457/SJH.200512.0001）
- <sup>20</sup> 符麗平：〈《三國演義》「七擒孟獲」情節源流考〉，《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頁39-44；後收於符麗平：《從三國史到《三國演義》

變與文本批評》<sup>21</sup>等文章，大抵都是依循此脈絡所書寫而成；其他還有部分是針對雕塑、戲曲等藝術南蠻形象的討論，比如鄧琇文與鄭德輝合著的〈「竹淬」——以竹工藝應用於鎧甲造型創作之研究〉<sup>22</sup>便嘗試以竹編方式來將演員裝扮為烏戈國的藤甲兵。

然而，以元、明兩代三國故事中「南蠻」形象與明代土司的比較，並針對兩者間的關聯性的討論，則未見於前人研究之中；以下就透過對比史料記載、元代《三國志平話》<sup>23</sup>（以下稱《平話》），以及《三國志通俗演義》（以下稱「嘉靖本」）<sup>24</sup>的情節與內容差異，加上明代對土司制度的記載，來討論、析辨由「南蠻」在元、明之際，三國故事創作者與受眾間的想像與作用。

## 二、史料中的「孟獲」、「南蠻」與《平話》對比

「蠻」字，是中文對於「異族」，特別是相對於中原而言較為南方的原住民的貶低詞，《禮記·王制》中記載：「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sup>25</sup>而自元代的《平話》中，孟獲被賦予「蠻王」形象，並被刻意在三國故事情節中擴寫與渲染。然而，孟獲的史料形象，卻與《平話》中所提及的樣貌，

---

義》》，頁 209-219。

<sup>21</sup> 劉海燕：〈《三國志演義》「七擒孟獲」故事的文本演變與文本批評〉，《明清小說研究》2015 年第 1 期（2015 年 1 月），頁 155-173。（DOI：10.6814/THE.NCCU.CHI.008.2018.A08）

<sup>22</sup> 鄧琇文、鄭德輝：〈「竹淬」——以竹工藝應用於鎧甲造型創作之研究〉，《弘光學報》第 84 期（2019 年 9 月），頁 57-79。（DOI：10.6615/HAR.201909\_(84).0005）

<sup>23</sup> （元）佚名：《三國志平話》，收於《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著：《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sup>24</sup> （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收於《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著：《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三國志通俗演義》是否為羅貫中原本，至今學界仍未有定論，關於現存三國故事的版本考據，可參見（英）魏安（Andrew Christopher West）：《〈三國演義〉版本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sup>25</sup> 見王雲五主編，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6 年），頁 248。

有著明顯的差距。

關於史料對諸葛亮南征的記載，陳壽於《三國志》<sup>26</sup> 正文中，全未提及孟獲的名字，惟裴松之注解（以下稱「裴注」）於〈諸葛亮傳〉中引《漢晉春秋》有略記（《蜀書五》，頁 8 上 -8 下）<sup>27</sup>，又在〈馬良傳〉中引《襄陽記》中提及馬謖「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蜀書九》，頁 5 上）的建言一段前方有出現，此外便沒有相關記載，整體而言，《三國志》不僅孟獲人物的形象描述不多，對於南征的情節也未細說；<sup>28</sup> 相較而言，《華陽國志》所載之內容，便較完整地說明了事件的始末，而按其所載，孟獲不過爲雍闓之部曲，在高定元殺死雍闓之後取而代之，<sup>29</sup> 由此論之，史料所載，七擒七縱（赦）的情節是真實存在的，但關於孟獲的真實身分，則較接近雍闓底下的高階將領，雖然在地方上或有一定的勢力，但與「蠻王」這樣統領、統治廣大南方異域、異族的王族身分，是存在明顯差異的。

到了《平話》的情節中，孟獲最早出場，是劉備爲報關羽之仇「問蠻王孟獲借十萬軍」，結果被東吳打敗；其後劉禪即位，孟獲派人來要回十萬軍，但蜀國耍賴不還，結果孟獲另起十萬軍，和蜀國南方守將共同「反叛」，才引發「七擒七縱」的故事。<sup>30</sup>

---

<sup>26</sup> （西晉）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 年，宋紹熙刊本）。

<sup>27</sup> 裴注引《漢晉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

<sup>28</sup> 《三國志》本文中對南征的敘述較少之外，相關的記載也被分散在各不同的傳記中，如後主、李恢、馬忠等人的傳中略有概述，而裴注亦僅在〈明帝紀〉引《魏略》中略提之；然就算將這些部分全部拼湊起來，仍不及《華陽國志》的記載來得清楚。

<sup>29</sup> 「亮欲俟定元軍眾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為主。」見（東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241。乾隆通州李調元輯刻《函海》本中，「孟獲代闓為主。」之「主」錄為「王」，然不影響本文論述，故於此提出，不再申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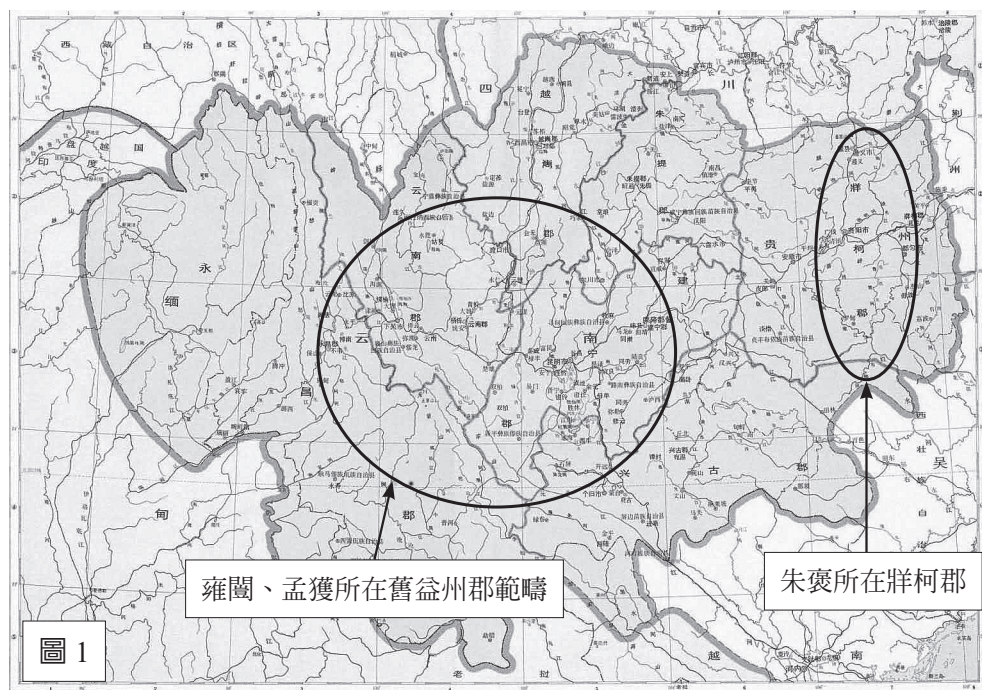
<sup>30</sup> 《三國志平話》中，孟獲出場之情節，皆集中於卷下，頁 14 下 -17 下，此後不再注。

在這樣的內容中，對「孟獲」與「南蠻」出現了與史料明顯不同的想像；就孟獲個人而言，《平話》予以了「蠻王」的身分，在情節中將孟獲的身分地位抬高到王族，而並不將之歸於雍闓的下屬，原來領導叛亂的朱褒、高定元等人則未見於情節中；而既然用的是「叛」，那就表示原來「蠻王」雖稱為「王」，但在敘事邏輯下，實則是臣服於蜀漢政權底下的一股較大的邊疆「異族」勢力而已，其地位與力量，並無法與中原王朝或魏、蜀、吳等漢人所建立之國家的「帝」、「王」相提並論。而在針對「南蠻」整體的「異族」、「異域」想像，則可以整理出以下四點：

一、聚落、地理名稱的不同。雍闓等人雖同為叛將，但其所把守之聚落皆稱「關」、「郡」或「鎮」，與中原王朝之地名相同，但對孟獲所領導的聚落，則被稱為「九溪十八洞」<sup>⑪</sup>，雖本質上是一種對地名的誤植，但可見三國故事的創作者，是企圖透過陌生地理名詞的差異，製造「漢」與「蠻」之間的「異國風」設定的效果，並突顯彼此之間的文化差異。

---

⑪ 「九溪十八洞」一詞，見（明）宋濂、王禕等編：《元史·世祖九》：「辛亥，四川行省參政曲立吉思等討平九溪十八洞，以其酋長赴闕，定其地，立州縣，聽順元路宣慰司節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明洪武刊本），卷12，頁20下。明代曹學佺《蜀中廣記》中亦載：「西陽宣撫司……其地廣袤七百里，東至保靖宣撫司界，西至彭水縣界，南至平茶長官司及思南沿河界各三百里，北至大田軍民千戶所界四百里……其屬有九溪十八洞蠻，惟是九江後溪西南一帶近為鎮，篳苗殘破，境土日削，莫克恢復，常告急于我焉。」，見（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欽定四庫全書本），卷38，頁5下-6上。而無論是「順元路宣慰司」或是「西陽宣撫司」，其地理位置基本於今重慶市、湖南省與貴州省之交界，在諸葛亮南征時為朱褒所在之「牂牁郡」，和雍闓所在之「益州郡」（（西晉）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蜀書三·後主傳》：「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頁2上-2下），也就是當今之雲南地區，明顯有所出入，此時期之歷史地圖請參見「圖1」，出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3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頁24-25。；另，「洞」亦為「峒」，宋代開始便有這樣單位設置，劉美崧指出：「宋代在南方繼承和發展了唐代的羈縻州縣制度……這些羈縻州、縣、峒的土官皆接受宋朝頒發的『文帖朱記』（印信），其轄區納入宋王朝的版圖，保持鬆散的政治聯繫。羈縻州、縣、峒的土官多任用諸溪峒蠻原有土酋，羈縻制度不改變邊陲少數民族原有的經濟生產方式。」，見吳永章主編：《中南民族關係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頁178。



二、不同的自然環境，如「引軍南到蠻界，至芦水江。其江泛溪熱，不能進。武侯撫琴，其江水自冷。軍師令軍速過，言不聞蠻景煙瘴，芦水蜈蚣巴蛇，乃蠻地毒物。」、「六月半，大雪降中間，軍到焦紅江，深闊無計可過。軍師令人造風輪，隨風而過，正落在住處蒲關。」其中，過熱的江水、六月下雪呈現出了不同於漢人生活地區的異國風情之外，蜈蚣巴蛇，以及孟獲在兩軍作戰時「使人多驅虎豹」等特異的獸類，也顯示出不同於中原的生態樣貌與作戰思維。<sup>32</sup>

三、人文風貌的差異，包括不同宗教信仰和醫藥能力的差距，孟獲在情節中「遠赴哭娘廟燒香」，但這樣的廟宇並不見於漢族的信仰系統之中，極可能為三國故事創作者為營造「南蠻」異族形象，所虛構之神祇與廟宇——信仰、祀奉

<sup>32</sup> 當然此處也可見對諸葛亮人物形象與能力的美化，魯迅「近妖」之說，在此可以得證，見魯迅著，周錫山評註：《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圖書，2009年），頁208；然而，對於諸葛亮形象的美化與形塑，與三國故事對南蠻的想像雖有相互影響，但於此應先行分開論之。

神祇的不同，往往也是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表徵之一；<sup>33</sup> 又當孟獲「臥病不起，疼痛三日」的情節，又必須要靠蜀漢方面的「藥酒」才能康復，顯見兩方在醫藥能力上的差異，<sup>34</sup> 當宗教、醫學兩者被結合在一起突顯出南蠻與代表中原漢文化的蜀漢的差距時，也就同時彰顯了漢文化較進步的地位——這就是三國故事創作者於此所欲達成的效果，同時也是將「南蠻」視為漢文化的「他者」的重要表現之一。

四、異族擁有大量財富。在情節中，孟獲每次獲釋，都要對蜀軍交上一定金額的贖金，有記錄的就包括第一和第二次各別付了「十萬金珠」、第六次「五十萬貫金珠」和最後一次在蒲關投降時的「獻十車金珠」，便足見其財富，<sup>35</sup> 而對這樣的情況，諸葛亮是知情的，情節中寫到：

軍師曰：「你降麼？今日寨裡捉你。」蠻王不降。軍師：「鎖你赴川，征了蠻王，後斬爾。」蠻王怕死，又使金珠贖了。眾官告軍師：「蠻王者，

---

<sup>33</sup> 對此，Harold R. Issacs 指出：「族群之間的爭權奪利觸目可見，宗教在其中扮演的角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但始終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只是配角而已。很重要的一點是，在造成族群分裂並引發衝突的各種歧異當中，宗教一定有份。」，見（美）哈洛德·伊薩克（Harold R. Issacs）著，鄧伯宸譯：《族群》，頁 236。

<sup>34</sup> 醫學能力的差異除了是一種優勢國力的展現之外，「疾病」的本身也包括了不同的文化意義，例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便指出「疾病是懲罰這種觀點由來已久」、「在對疾病的想像與對異邦的想像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它或許就隱藏在有關邪惡的概念中，即不合時宜地把邪惡與非我族類（non-us）、異族等同起來。」見（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 年 1 月），頁 71、159-160。

<sup>35</sup> 「銖」實為重量單位，自秦開始到隋唐，皆存在「銖」為單位的貨幣，可參見劉精誠、李祖德：《貨幣史話》（臺北：國家出版社，2003 年 10 月），第三章與第五章，頁 51-74、97-120；而《平話》所載「金珠」，按上下文可分為兩種意思，其一為「金銀珠寶」之縮寫，其二為「金幣」之意，但元代貨幣制度混亂。參見千家駒、郭彥崗：《中國貨幣演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8 月），頁 65-66。真實價值不易推估，但若以「貫」為單位，則《元史·食貨》中載：「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見（明）宋濂、王禕等編：《元史》，頁 21 下。則其「五十萬貫金珠」若以元鈔論，可換白銀二十五萬兩，由此可論其價值甚高。

夷狄人也，放了三回五次？」軍師笑曰：「吾觀此賊，如同草芥，兼自西川國窮。」

由此可見，明顯情節中，諸葛亮存在基於經濟上的需求，為收取高額贖金而刻意多次放走孟獲，同行的「眾官」也接受此理由，顯示出對「異族」有巨大財富的想像與圖謀；雖說史料中確有諸葛亮南征後，得到一定程度可以供給蜀國的物資，<sup>36</sup>但《平話》情節中刻意虛構龐大財寶的數字，為的是造成異族擁有巨大財富的印象，而以這樣的印象又進一步強調了諸葛亮南征所得到的收益對國家的幫助，形塑一種英雄凱旋歸國並帶回戰利品，建立了巨大的武功的形象。

### 三、嘉靖本中的「南蠻」形象

而到了明代的嘉靖本，南蠻與孟獲的出現情節中，才有了更大篇幅的改編與擴寫，建構了更多不同於漢族，屬於南蠻與其他異族在人物與其他部分的細節，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在南蠻人物與民族外貌的刻劃上，嘉靖本著力更深，例如在人名方面，包括金環三結、董荼奴、阿會喃、忙牙長、朵思大王、帶來洞主、木鹿大王、祝融夫人、八納洞主和兀突骨、土安、奚泥等人物，與漢人的姓名都有明顯差異，而這些人物的名稱皆不見於《平話》之中，其中，「祝融夫人」是少數可以清楚說明姓氏出處的人物，她在情節中被設定為祝融氏的後代，<sup>37</sup>其餘人物

<sup>36</sup> 「亮收其俊傑，建寧嬰習，朱提、孟琰及獲為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禦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見（東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頁214。（西晉）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中亦載：「亮率眾南征，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頁8上。可見諸葛亮南征，應實有獲取一定程度之財產與物資。

<sup>37</sup> 「祝融」之名最早可見於《山海經》，相關的描述則分散在〈海外南經〉、〈大荒西經〉和〈海內經〉裡，其中〈海外南經〉對祝融的外在形象有較清處的描述：「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見（先秦）佚名，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

則大抵為三國故事創作者虛構之人物；而這些人物的姓名由來雖然不易釐清，但從包括「茶奴」、「牙長」、「突骨」等人的名字用詞中，便可以看出貶低之意。

另外，嘉靖本對南蠻民族身上配飾的刻劃也更加精細，加強了「異族」奇裝異服、不同於漢族的穿著形象，如孟獲就出現過兩次不同的裝扮：

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絡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腳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卷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廂寶劍（卷 18，30 下 -31 上）  
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欲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卷 18，頁 49 上）

而孟優的手下為「青眼黑面，黃髮紫須，耳帶金環，鬍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卷 18，頁 43 下）；祝融夫人則被描寫為「披髮跣足，身著絳衣，背插五口飛刀，手執丈八長標，坐下卷毛赤兔馬。」（卷 18，頁 67 下），木鹿大王和底下的蠻兵被描述為：

蠻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面目醜陋，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但篩金為號。木鹿大王腰掛兩把寶刀，手執蒂鍾，身騎白象，從大旗中而出。（卷 18，頁 69 下 -70 上）

---

年），頁 206。祝融夫人是南蠻人物中少數的女性人物，其重要性將於下一節說明；又，明朵思大王雖不知其名，然「朵思」一詞，與元代設立於西藏地區的「朵思麻路」或「朵思麻宣慰司」或有相關，雖就中原而言，藏區亦屬西南之異族領域，但是否「朵思大王」之名便因此而來，並無從判定，故而於此題出，不再申論。另，關於「朵思麻宣慰司」與「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是名稱與設立時間等問題，請參見陳慶英：〈元代朵思麻宣慰司的設置年代和名稱〉，《中國藏學》1997 年第 3 期（1997 年 8 月），頁 45-50。（DOI：10.6437/EM.198709.0018）此外，亦有如孟節、楊鋒等，與漢民族姓氏相近的人物出場，但除了人數較少之外，其立場也多與漢民族較親近，故不列入此段討論之中。

而「頭戴日月狼須帽，身披金珠纓絡，兩肋下露出生鱗甲，眼目中微有光芒」（卷 18，頁 78 下 -79 上）的，是烏戈國王兀突骨；珍稀的材料、鮮豔色彩元素所構成的盔甲、特殊的兵器與法器，以及面容、身體的醜陋或裸露，搭配特殊座騎如「赤毛牛」、「卷毛赤兔馬」<sup>38</sup>、「白象」等，相對較為漢化的孟節「竹冠草履，白袍皂緣，碧眼黃髮」（卷 18，頁 59 上），以及代表漢民族的蜀軍「設宴在寨，卻教帳中擺開七重圍子手，刀槍劍戟，燦若雪霜；又執御賜黃金鉞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各各抖擻精神」（卷 18，頁 32 上 -32 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卷 18，頁 50 下），諸葛亮「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諸將簇擁而來」（卷 18，頁 49 上）的形象，除顯示出南蠻軍與蜀軍的服飾、裝備和儀容有明顯不同外，更是透過摹寫造成「異國」的奇幻視覺效果，<sup>39</sup>進一步建立起對南蠻族群想像的基本外貌。

第二個特點，在嘉靖本對特殊的地理、生態樣貌，相較《平話》，描述得更加細膩與奇幻，除了接續並擴寫《平話》裡「瀘水」的情節之外，還加上了「啞」、「滅」、「柔」、「黑」四個可致人於死的「毒泉」，與能夠為其解毒的「萬安溪」與「安樂泉」等由當地「山神」所述之虛構的水文地景與風貌，這最後也為後來發明饅頭的情節埋下伏筆。

此外，當孟節指出：「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蠍，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為井，汲水飲之，方可。」也同時點出了「蠻境」之植物與中原的不

<sup>38</sup> 董解元：《古本董解元西廂記》第 2 卷中，載一段：「為首強人英武，見了早森森地怯……騎足如龍卷毛赤兔……是把橋將士孫飛虎」，見（金）董解元：《古本董解元西廂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嘉靖刊本），卷 2，頁 1 上。是否為早於嘉靖本尚待考，然其中之「龍卷毛赤兔」名稱確與孟獲、祝融夫人之座騎相類，然兩者間之關係非本文所欲討論之重點，故於此點出，不再申論。

<sup>39</sup> 何兆華：「服飾作為載體符號能夠塑造與描述流行，不但承載了人的意圖，還會直接的指出意圖的方向……服飾作為一個能承載意圖與策略的載體，它同時具有小至個人，大至國家與社會的尺度，這正是服飾之所以是一個特殊的「物」，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多元、多重且多樣的人類社會與文化。」，見何兆華：〈人觀、歷史與服飾：導論〉，《民俗曲藝》第 216 期（2022 年 6 月），頁 3。（DOI：10.30157/JCRTF.201006.0001）

同，柳花在《本草綱目》中的記載是「苦，寒，無毒。」的一種植物，但在蠻境卻成為溪泉水不可飲用的原因之一，也就說明了不只是人，整個「蠻境」的生態，對於漢文化而言，都必須被視為「他者」的一部分——雖然招待孔明的「松花菜」、「栢子茶」是中原可見之物，不過用以解毒的「薤葉芸香」，<sup>40</sup>就是只有當地才有的藥材。<sup>41</sup>

此外如「毒蛇惡蠍」、「虎豹豺狼」等當地動物，與南蠻將領之座騎，則營造出了「蠻境」是有著「珍奇異獸」的「異域」，<sup>42</sup>尤其是蠻族將領驅使這些動物，配合蠻兵與蜀軍交戰的情節，更成為加深民族之間有著巨大差異的表現手法。<sup>43</sup>

第三個特點，是加深讀者對漢族與南蠻之間文化差異的印象，並強調諸葛亮所代表的蜀漢政權與文化高於南蠻文化。南蠻自知文化水準不及蜀漢的設定很明

---

<sup>40</sup> 以上情節出自嘉靖本卷18，頁56上-60下；又，「松花菜」即花椰菜之品種之一，（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縣：培琳出版社，1996年）中載為「天菜菔」，言其「釋名天花菜……出山西五台山。形如松花而大，香氣如菔，白色，食之甚美。」，見卷28，頁18；「栢子茶」實為「柏子茶」，即以「柏子仁末，溫水調服」，見卷34，頁2；「薤葉芸香」又作「韭葉芸香」，見（明）蘭茂：《滇南草本》（上海：世界書局，1937年），頁61。

<sup>41</sup> 對於植物相關的記載，確有其研究價值，潘富俊指出：「植物各有其不同的生境，有些植物適合生長在水塘或沼澤；有些植物則屬於生態上的先驅植物，在荒廢土地上生長茂盛。這些植物特性，都是文學作品中用以襯托或描述故事情節發生地點的特殊環境……許多古老的植物利用方式，目前已經罕見或甚至消失了，但仍可在各代小說中再現，提供中國民俗研究的基本資料。」，見潘富俊：《中國文學植物學》（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2年），頁79-80。

<sup>42</sup> 梅錚錚：「刻意將孟獲非漢人化，是出於小說故事構造的需要，比如加入藤甲兵、騎白象驅趕虎豹豺狼，毒蛇猛獸蠻王參戰的情節，使故事情節跌宕起伏，精彩紛呈。」，見梅錚錚：〈論孟獲族屬及諸葛亮南征意義〉，《看歷史》2023年第5期（2023年10月），頁31-32。（DOI：10.6435/SHM.197310.0343）

<sup>43</sup> 「無論就體質而言，還是就精神而言，本地動物與本地人的關係，總比外來動物和本地人的關係更和諧。比如說，野蠻種族就因為與動物心智相通而擅長馴化動物，不僅如此，由於這些種族所處地域的環境不同，風俗也不同，彼此的擅場也有區別。」見（英）胡司德（Roel Sterckx）著，藍旭譯：《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138。

顯，除了提到過去伏波將軍馬援曾經來過南蠻屬地之外，<sup>44</sup> 對於南蠻信仰和民俗也有所描寫：

山中置宮殿樓台，以為蠻王之巢穴。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四時殺牛宰馬享祭，名曰「卜鬼」。每年常以蜀人並外鄉人祭之，即與採生之類相同。若人生病，不肯藥服，只禱師巫，名曰「藥鬼」。其處無刑法，但犯罪則斬。有女長大，卻於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混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為「學藝」。年歲雨水均調，則種稻穀，倘若不熟，殺蛇為羹，煮象為飯……孟獲在洞中，聚集宗黨千餘人，飲宴於宮中，皆不用坐榻，俱席地而已。（卷 18，頁 64 上 -65 上）

其中「採生」又作「采生」，為支解活人的身體部位以為獻祭之意，在《元史》<sup>45</sup>、《明史》<sup>46</sup> 中皆明定為犯罪之外，男女私通、<sup>47</sup>「殺蛇為羹，煮象為飯」，以及「不用坐榻，俱席地而已」等等，被展現在孟獲的「宮殿」之中，突顯了被漢民族認為不雅或怪異的飲時與行為，在「南蠻」是可以被公開甚至於王族面前展示的活動；此外，嘉靖本中，虛構了孟節這一個雖是孟獲與孟優的親生

---

<sup>44</sup> 此段敘述實有史料根據，《元史·安南》中記載：「安南國，古交趾也。秦并天下，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交趾居其一。後女子徵側叛，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為漢界。」，見（明）宋濂、王禕等編：《元史》，卷 96，頁 1 上。

<sup>45</sup> 同前註，卷 104，頁 7 下 -8 上。

<sup>46</sup> 見（清）張廷玉等：《明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年，清乾隆武英殿原刊本），卷 94，頁 13 下。

<sup>47</sup> 中國西南民族存在「跳月」的風俗，詳情可參考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婚禮記》中的禮學世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9 期（2006 年 9 月），頁 47-83。（DOI：10.6351/BICLP.200609.0047）關於「跳月」風俗之記載，表現了當地族群自由戀愛的風氣，但皆未出現直接於野外之溪中有肌膚之親的情況，且婚姻、男女關係仍受到一定程度的監督，不似嘉靖本引文中提到的「父母不禁」，三國故事創作者是否參考此風俗來建構對「南蠻」的想像，因其描述篇幅太小，實無法確認，但其透過男女間的性自主行為來說「南蠻」與「漢」相較下的不知教化、禮法，則甚為明顯。

兄長，但對自己民族看不出有認同感、內心向著漢朝的人物；而當諸葛亮征服了南蠻，情節中還安排了「蠻夷」對入侵者的感謝之情：

此時蠻夷皆感孔明之恩德，乃與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祭，呼之為「慈父」；皆運珍珠金寶、丹漆藥材、耕牛戰馬拜送孔明，以資軍用。後有進貢天子禮物，終身不反。南方已定，皆是孔明之功。（卷 18，頁 84 上）

抬高諸葛亮的形象，去除了其所代表的漢文化的入侵者身分，合理成一個感化、拯救落後異族的上位有德者，對比孟獲：「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佔地土，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為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境內州郡，何為反耶？」（卷 18，頁 33 上）的說法，可見兩者在認知上的差異。

小結元、明兩代對孟獲、南蠻的書寫，多為三國故事的創作者的虛構與想像，經過元、明之際受眾的篩選後，所留下的「南蠻」形象。就元代而言，蒙古人來自北方，對漢人多有迫害，但又不能直接批評，故以「南蠻」為對象，在作品中抬高代表漢民族的諸葛亮，貶低同樣是「異族」的孟獲，間接用藝術化的手法，表達了對蒙古人的批判與不滿，同時也透過這些可以被清楚辨析的差異，確立當時被不平等對待的漢民族的民族自信與文化認同；到了明代，蒙古人已被漢民族所打敗，情節原用於批判統治者的作用消失，取而代之為明代因娛樂、好奇等需求，藉「七擒七縱」情節所創造出「南蠻」這樣不存在於現實的想像民族。

#### 四、「南蠻」和「土司」的形象重疊

除了上一小節中所討論的差異之外，嘉靖本還有一處不同於《平話》的部分，那是孟獲出場的安排，出現在第 17 卷，曹丕號召五路大軍要攻打蜀國，擔任聯手魏國共同伐蜀的其中一路大軍；不同於《平話》劉備借兵在前而蜀國不願還的情節，在嘉靖本中，既然孟獲是先動手的一方，那諸葛亮自然也就出師有名——而與此便延伸出了另一個問題，孟獲到底是被視為原本臣服、被分封於蜀漢的邊陲的地方勢力，又或只是單純屬於「化外之邦」的「異族」？

前述已討論過史料中關於孟獲的文字記錄，多年來，學界對孟獲的討論，多集中在比對史料和故事的差異，又或是不同版本、時代下孟獲人物形象在三國故事中對其他人物或情節所帶來的意義；<sup>48</sup>然而，不單是孟獲，而是整個「南蠻」族群，在元到明代間的三國故事的形象被大量改編與擴寫，創作者除了受到這兩個時代時空背景與政治影響之外，爲了得到受眾的喜愛，近而運用、移植當時代的異族元素的可能性是很高的。<sup>49</sup>

由此論之，孟獲被想像、虛構給創作出來的「蠻王」形象與身分，必須正好符合漢民族需要建構民族自信的素材，一來要給被歷來三國故事給高度美化的諸葛丞相一個名位上可以匹配的對手，另一方面，孟獲與「南蠻」族群，也必須被當成是「叛變」的邊陲地方異族，才能讓蜀軍的軍事行動從「侵略」變成「掃蕩」與「平叛」，並合理化「南征」的目的；此外，對於南蠻軍、民與人物的描寫，也必須要能滿足當時代故事受眾對於異國、異族想像與新鮮感的需求，才能達到廣泛流傳的功效——故而，「南蠻」在嘉靖本中，被設定爲原來臣服於漢朝，而後叛亂的諸多不同異族的總稱，加上由孟獲所代表「蠻王」，便成爲最適合嘉靖本的故事設定。

但要憑空建構、想像一個族群，實非容易之事，從史料與《平話》的討論中，可以看到文獻與故事情節中，南蠻的細部描寫並不算豐富，故而，嘉靖本中「南蠻」族群的想像與其原型如何而來，就成爲了一個問題。

對此，關於明代三國故事的創作者如何建構「南蠻」想像，或能從明代「土

---

<sup>48</sup> 如劉海燕便指出：「『七擒孟獲』故事的文本差異似乎也可以昭示：小說文本原創者寫定之後的早期傳播階段，便不斷在被人修訂著。這些修訂者，或者如費守齋刊本批註者所認為的，是那些添加『東川掠敵』之『花關索』故事的『好事者』之流；或者如周曰校本識語中所稱，是『敦請名士，按鑒參考，再三讎校』的『名士』之流。大致修訂者的史學知識和文字功底是參差不齊的。」，見劉海燕：〈《三國志演義》「七擒孟獲」故事的文本演變與文本批評〉，頁172。

<sup>49</sup> 「情節『移植』實質上也是一種典型化的藝術手段。《三國演義》中大量的移植情節，雖然與歷史事實有悖，但卻完全符合藝術創作的規律，已為廣大讀者所接受。」，見劉永良：《三國演義藝術新論》（北縣：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年），頁121。

司」、「宣慰司」一類的職位中看出端倪，《明史》對土司的記載為：

嘗考洪武初，西南夷來歸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銜號曰宣慰司，曰宣撫司，曰招討司，曰安撫司，曰長官司。以勞績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縣之名亦往往有之。襲替必奉朝命，雖在萬里外，皆赴闕受職。  
(卷 310，頁 1 下 -2 上)

按其所載，「土司」可分為湖南、四川、雲南、貴州與廣西等五大地區，其中又以「雲南土司」中所載「百夷」族與其首領思倫發，最近南蠻民族與孟獲的原型：

(洪武)十八年，百夷思倫發叛，率眾十餘萬攻景東之北吉寨。……二十三年，沐英討平思倫發，復景東地，因奏景東百夷要衝，宜置衛。  
(卷 313，頁 12 上)

二十二年，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言：「往者逆謀，皆由把事刀廝郎、刀廝養所為。乞貸死，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乃遣通政司經歷楊大用齎敕往諭思倫發修臣禮，悉償前日兵費，庶免問罪之師。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並令獻叛首刀廝郎等一百三十七人，平緬遂平。自是，三年每來朝貢。二十七年，倫發來朝，貢馬、象、方物。已，遣京衛千戶郭均英往賜思倫發公服、襪頭、金帶、象笏。二十八年，緬國王使來言，百夷屢以兵侵奪其境。明年，緬使復來訴。帝遣行人李思聰等使緬國及百夷。思倫發聞詔，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長刀幹孟叛，思聰聽朝廷威德諭其部眾，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服其下，強留之，以象、馬、金寶為賂，思聰諭卻之。歸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為《百夷傳紀》以進，帝褒之。(卷 314，頁 22 上 -22 下)

初，洪武間，克平雲南，惟百夷部長思倫發未服，後為頭目刀幹孟所逐，赴京陳訴。命為宣慰，回居麓川。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隸雲南；設潞江、乾崖、大侯、灣甸四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元年升孟養、

木邦為宣慰司。（卷 314，頁 25 下）

由這些記錄可見，明軍與百夷族與其首領思倫發，在洪武年間反反覆覆有過數次作戰，百夷屢降後又叛，〈沐英傳〉中，也對討伐百夷之事有所記載：

（洪武）二十年平浪穹蠻，奉詔自永寧至大理，六十里設一堡，留軍屯田。明年，百夷思倫發叛，誘群蠻入寇摩沙勒寨，遣都督甯正擊破之。二十二年，思倫發復寇定邊，眾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炮勁弩為三行。蠻驅百象，被甲荷欄楯，左右挾大竹為筒，筒置標鎗，銳甚……因乘風大呼，駁弩並發，象皆反走。……大軍乘之，斬馘四萬餘人，生獲三十七象，餘象盡殪。賊渠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以死。思倫發遁去，諸蠻震懼，麓川始不復梗……帝親拊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還鎮，再敗百夷於景東。思倫發乞降，貢方物。阿資又叛，擊降之。南中悉定。使使以兵威諭降諸番，番部有重譯入貢者。（卷 126，頁 19 上 -20 上）

由此段史料看來，雖說不能斷言百夷族的思倫發即為孟獲的原型人物，但如以火炮、駁弩使「象群反走」，與嘉靖本中諸葛亮以假獅子嚇退木鹿大王群獸並反衝蠻兵的情節有相通之處。<sup>50</sup> 另外，從歷史地圖上來對比（見圖 2<sup>51</sup>），可見孟定府又稱為「馬援城」，南方包括孟璉司、孟艮府等，皆為傣族與佤族的自治縣，

<sup>50</sup> 「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語，手搖蒂鍾。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如同驟雨；鳴鳴聞畫角之聲，只見虎豹豺狼、毒蛇猛獸乘風而出，張牙舞爪，衝將過來……，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彩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線為衣毛，鋼鐵為牙爪今之『獅子』也，一個可容十人。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煙火之藥，藏在軍中……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蒂鍾；腰間寶刀掣出，要斬孔明。頃刻之間，狂風大起，猛獸突出，孔明將羽扇一搖，其風便回本陣中去了，蜀陣中假獸擁出。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燄，鼻出黑煙，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不敢前進，皆奔回本洞去了，反將蠻兵衝倒無數」，見嘉靖本，卷 18，頁 70 上 -71 下。

<sup>51</sup>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7 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 年），頁 76-77。

而傣族又稱「擺夷族」、「百夷族」，錢古訓在〈百夷傳〉<sup>52</sup>中記到：

百夷，在雲南西南數千里，其地方萬里……漢以前未嘗通中國，諸葛亮征蠻，亦抵怒江而止……國朝洪武辛酉，平雲南。明年，思瓦發寇金齒。是冬，思瓦發略於者闌、南甸。其屬達魯方等輒立滿散之子思倫發，而殺思瓦發於外。即譴使貢白象、犀、馬、方物於朝。

（頁 161-162）



其中所提到地理位置、歷史、族群與「象、犀」這些動物，皆與嘉靖本中「南蠻」族群的形象相近，同時在醫藥能力方面，〈百夷傳〉也記到：「無醫卜等書。不知時節，惟望月之盈虧爲候。有事惟雞卜是決。疾病不知服藥，以薑汁注鼻中。病甚，命巫祭鬼路側，病瘡者多愈，病熱者多死。」（頁 167）這也與三國故事中，南蠻醫藥能力落後的情節相通；此外，黃開華在〈明代土司制度設施與西南開發〉<sup>53</sup>一文中，針對土司設置的情況有詳細研究，同時也提到在明代的制度裡，存在著許多女性的土官：

<sup>52</sup> （明）錢古訓：〈百夷傳〉，收於高國祥主編：《中國西南文獻叢書·西南民俗文獻·第4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59-174。

<sup>53</sup> 黃開華：〈明代土司制度設施與西南開發〉，收於余貽澤等著：《明代土司制度》，頁27-218。

永樂間，楚雄府土同知設箭坤成之以妻襲夫（高政），宣德初，高思弄之以女襲母，雖位處僚佐，未見作為，然思弄之朝聖闕，跨象入城，萬人空巷，爭覩變女儀飾，亦當時之美談也。至若畫家為繪之「蠻女貢象圖」，尤極一時之珍。（頁 146）

由此便能說明，為何元代的故事情節中，不見南蠻有女性人物，但在嘉靖本中，卻出現了祝融夫人這樣形象與個性鮮明、衝擊力強烈的異族女性；<sup>54</sup> 黃開華還提到了明政府在土司地帶興起儒學，透過教育的方式，或說思想管控的方式，讓明朝對土司的管理達到了「變夷為華」（頁 166）的成效，黃氏指出：「有雲南土官，感受儒學教育，深明大義，不惟躬自興辦儒學，尤於邊夷土官意圖乖離朝廷之際，正氣殊至凜然，足使頑廉懦立。」（頁 177）這也就是嘉靖本中，對於自身文化已無有認同，一心向著漢政權、漢文化的「孟節」的人物原型，而加入此人物的目的，應是為了符合、討好漢族受眾對於自我文化強大、優越感的需求和喜好，同時也將南蠻族、孟獲等想像的「異族」形象確立了起來，成為往後三國故事流傳中，「七擒七縱」情節的基底。<sup>55</sup>

值得注意的是，「南蠻」實為多元族群所共同組成的概念，故而孟獲雖為

<sup>54</sup> 林主偵：「『辣女』的典型，大概是可以從或虛或實的書寫中看出端倪的。在正史、野史中，都曾出現以特殊女性為主角的片段，從卓文君、鮑三娘、祝融夫人到秦良玉，這些虛實交雜的人物所反映出的形象，摻雜了人們對於邊疆地區層層由內而外，女性愈加不符合常規的想像」、「孟獲所代表的是蜀地之外更偏遠的部族首領。其妻祝融夫人所代表的則是『番邦蠻子』中更遠離文明的番女，亦是女性部族領袖的典型，二者是部族間的聯姻結盟。」、「以女性為部族首領，出現於漢人所敘佚事中，反映了漢人對此的難以料想與驚奇。但這種情形在邊疆民族可能並不特別」，見林主偵：〈不存在的邊地婦女〉，《婦研縱橫》第 112 期（2020 年 4 月），頁 55-57。（DOI：10.6256/FWGS.202004\_(112).07）

<sup>55</sup> 劉海燕：「『七擒孟獲』故事，在嘉靖壬午本大致已經定型，到最後作為定本的毛評本，儘管採用的是有『關索』情節的周曰校本、李卓吾評本等的故事文本，然而嘉靖壬午本的文字風格在這一系統版本中相沿不替。」見劉海燕：〈《三國志演義》「七擒孟獲」故事的文本演變與文本批評〉，頁 172。

蠻王，但如烏戈國便明顯是另外的族群，而朱孟震在〈西南夷風土記〉<sup>56</sup>中，除記有「風氣四時皆熱。五六月，水如沸湯，石若爍金。三宣、蠻莫、迤西、木邦、茶山、黑麻，皆瘴癘毒惡。」（頁5）與瀘水、四毒泉的情節接近之外，又記「男子藤盔藤甲，不畏刀槍」（頁8）一段，與兀突骨率領「刀劍皆不能入」（卷18，頁73下）的藤甲兵的形象高度重疊——查元以前之兵書，如《武經總要》<sup>57</sup>中，並不見「藤甲」之相關記載，但明代的《武備志》<sup>58</sup>與《火龍神器陣法》<sup>59</sup>中，則皆記載了「藤甲」與「藤牌」，就兩本兵書的成書年代而言，其內容雖有可能是受到三國故事影響所杜撰、想像出來的產物，<sup>60</sup>但可見此般裝備為明代後才出現，無論是否受三國故事影響，其有一定程度的當代性是確立的。

- 
- <sup>56</sup> （明）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收於高國祥主編：《中國西南文獻叢書·西南民俗文獻·第4卷》，頁1-14。
- <sup>57</sup> （北宋）曾公亮：《武經總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 <sup>58</sup> （明）茅元儀：《武備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明天啟刻本）。
- <sup>59</sup> （明）焦玉：《火龍神器陣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年翁心存抄本）。
- <sup>60</sup> 《武備志》中為「赤藤甲」：「以赤藤五十斤石槽水浸半月，取出晒三日，復入槽、添水，如此浸滿一週歲，晒乾照式編穿共二十副，其外桐油油之，其甲輕堅能革矢、刃，利於水大；又以此藤作笠，臨敵作盔，陰則備雨，又以軟藤編作圓牌，中高邊起，披此甲而執此牌，進退撫護便利攻擊也。」，見（明）茅元儀：《武備志》，卷105，頁15上。《火龍神器陣法》中則言「惟諸葛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遇異人秘授火攻陣法，感先主三顧之勤，盡鞠躬後已之力，燒藤屯於博望，鏖兵於赤壁，火藤甲於長板」（火龍神器陣法授受序，頁1下）、「天地好生之德違之恐奪己壽，武侯之焚藤甲已明鑑矣。」（頁26下）觀其內容，《武備志》所言或真有其事，而《火龍神器陣法》所言則多與史料不合，應受三國故事影響後所杜撰，對此李斌認為：「題焦玉撰于明初的火攻書《火龍神器陣法》、《火龍經》等，雖然保存了一些明代前期火器技術的內容，但其成書時間比永樂十年要晚得多，大約到嘉靖末年始有抄本流傳。」，見李斌：〈《火龍經》考辨〉，《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1期（2022年2月），頁38。（DOI：10.978.75228/03876）鄭誠則指出：「《火龍經》載有紙麻竹木所制火器，多淫巧而不實用，或許是受到了煙火匠師的影響：煙火匠師中的能工巧匠，對於改進軍用火器性能，也可以做出實質貢獻，兩者之間並不矛盾。」見鄭誠：〈中國火器史研究二題：《火龍經》與火藥匠〉，《自然科學史研究》第35卷第4期（2016年12月），頁448。（DOI：10.3724/SP.J.7102771783）

由上述可見，到了明代嘉靖本中對於「南蠻」的想像，除了三國故事創作者的虛構之外，其「異族」的概念在「七分事實，三分虛構」<sup>61</sup>的敘事建構之下，實大量借鑒了明代對於西南土司，尤其百夷族的形象，以及當朝對於土司管理、交戰的經驗與文人所著之民俗見聞，可以說，嘉靖本對「南蠻」的想像，並非企圖還原三國時代，諸葛亮與孟獲作戰的真實歷史樣貌的，<sup>62</sup>而是透過綜合了明朝當代對西南土司的「異族」經驗，再結合自古「華夷之辨」的思維，所建構起來、專門為明代受眾安排的「南蠻」民族的想像。

## 五、結論：「南蠻」形象的作用

總結三國「七擒七縱」故事，自史料、《平話》到嘉靖本之間的情節變化過程，實際上是不同的創作者們與其身處當代元素、受眾喜好的影響下，所建構成的一套對於南蠻「他者」的想像，比起歷史原貌的還原，更在意內容的奇特性。

而對「蠻」族形象的建構，可以發揮以下三個作用，其一，諸葛亮「南征」、「七擒七縱」的情節，在三國故事中是代表漢民族的蜀國與代表異族的「南蠻」的交鋒，對於創作者而言，透過虛構、雜糅而成的「南蠻」民族想像，進一步確立並強化「漢」的自我認同，這有助於受眾對於故事的接受，以及故事在漢族社會的流傳——在元代，這樣的自我認同，包含著對蒙古政權的不滿與對抗思想，而到了明代，則成為創作者與受眾共同維護自身文化優越感的工具和手段，兩者之間交互影響，更加深了面對「非我族類」的「異族」、「他者」概念

---

<sup>61</sup> （清）章學誠著，馮惠民點校：《丙辰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90。

<sup>62</sup> 「《演義》的文本構成既有敘事性文本構成的一般特點，又有歷史演義小說自身獨具的特殊性。小說在其歷史形成的衍化流變過程中，保留了史傳中對歷史行程框架的記述，並借用了部分史傳文本，其中又融合了前代志人小說（如《世說新語》）、志怪小說（如《搜神記》）、民間傳說故事和戲劇、講史技藝中經過再創作的素材，這些來源不同的素材經過作者天才的藝術創造，經由重新建構藝術情節的敘述操作，構成了和諧有機的藝術整體，以審美化方式展現出了三國時期的歷史風貌」，見劉博倉：《《三國演義》藝術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18。

時，以諸葛亮的完勝神話為代表，漢族的民族自信、認同，以及自認高等文明姿態。

其二，在對「南蠻」的想像情節中，「祝融夫人」的人物形象鮮明強烈——她性情奔放、衣飾華麗，與傳統漢人社會中受重重規範束縛的女性形象形成明顯的對照；這一設定並不僅止於異域獵奇，而是藉由「他者」的映照，側面折射出漢族女性在現實處境中所承受的身心壓抑，以及服裝樣式與色彩上所受到的種種限制與規訓。<sup>63</sup>

其三，是到了嘉靖本的情節中，對於「南蠻」想像所運用的當朝「土司」的元素，實則為當代政治價值觀與創作者的藝術手法的展現——其一方面能想像、關心當朝政府的施政，或是用以宣傳政績的一種途徑，表現出在專制體制下，不在朝為官的知識分子，乃至於普羅百姓因無法參與，而對政治產生的好奇與想像，並且也顯示人民對於一個理想的統治者，在政治、軍事與對外關係上應有的表現與期待；另一方面，「異族」所代表的「他者」、不同於「我族」的想像，也提供了漢文化受眾在閱讀故事或欣賞相關戲曲作品時新奇的娛樂體驗。

而透過觀察不同時期三國故事對「南蠻」的想像，可以發現在不同時代和政治環境的變化之下，雖然三國故事情節中說的乍看是同一個「異族」、同一個「蠻王」，彼此間也有部分繼承的元素，但實際上每一個時代透過對「他者」的想像，除了不同文類或藝術技法的呈現與娛樂性之外，也闡述、記錄著不同於官方資料，而屬於民間的創作者與受眾們對當時世界的理解角度。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先秦）荀卿著，（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北京：中

---

<sup>63</sup> 周錫保在針對明代一般婦女的服飾研究指出：「按規定民間婦人的禮服，只能用紫色純（一種次於羅網的類乎於布的衣料），不用金繡。如著袍衫，只能用紫綠、桃紅及淺淡的顏色，不能用大紅、鴉青、黃色。帶則用藍絹布。」見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臺北：南天書局，1992年），頁409。

- 華書局，1954 年）。
- （先秦）佚名，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 年）。
- （西晉）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 年，宋紹熙刊本）。
- （東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 （北宋）曾公亮：《武經總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 （南宋）朱熹：《四書集註》（臺南：大孚書局，1991 年）。
- （金）董解元：《古本董解元西廂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嘉靖刊本）。
- （元）佚名：《三國志平話》，收於《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著：《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 （明）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收於高國祥主編：《中國西南文獻叢書·西南民俗文獻·第 4 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14。
- （明）茅元儀：《武備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明天啓刻本）。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縣：培琳出版社，1996 年）。
- （明）宋濂：〈論中原檄〉，收於（明）程敏政編：《皇明文衡》（上海：商務印書館，1967 年，上海涵芬樓本）卷之 1。
- （明）宋濂、王禕等編：《元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年，明洪武刊本）。
-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欽定四庫全書本）。
- （明）焦玉：《火龍神器陣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年翁心存抄本）。
- （明）錢古訓：〈百夷傳〉，收於高國祥主編：《中國西南文獻叢書·西南民俗文獻·第 4 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59-174。

(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收於《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著：《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明)蘭茂：《滇南草本》（上海：世界書局，1937年）。

(清)張廷玉等：《明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清乾隆武英殿原刊本）。

(清)章學誠著，馮惠民點校：《丙辰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二、近人專著

### (一) 專書

(美)哈洛德·伊薩克(Harold R. Issacs)著，鄧伯宸譯：《族群》（北縣：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9年）。

(美)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

(美)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

(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年）。

(英)胡司德(Roel Sterckx)著，藍旭譯：《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

(英)魏安(Andrew Christopher West)：《《三國演義》版本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千家駒、郭彥崗：《中國貨幣演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王雲五主編，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6年）。

余貽澤等著：《明代土司制度》（臺北：學生書局，1968年）。

吳永章主編：《中南民族關係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

沈伯俊：《賞味三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臺北：南天書局，1992年）。

符麗平：《從三國史到《三國演義》》（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

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

劉永良：《三國演義藝術新論》（北縣：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年）。

劉博倉：《《三國演義》藝術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劉精誠、李祖德：《貨幣史話》（臺北：國家出版社，2003年）。

潘富俊：《中國文學植物學》（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2年）。

魯迅著，周錫山評註：《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圖書，2009年）。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3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7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

關四平：《三國演義源流研究 下編：傳播研究》（臺北：龍視界出版社，2014年）。

## （二）期刊論文

王志強：〈蜀漢正統視域下的諸葛亮七擒孟獲〉，《史壇縱論》2023年第5期（2023年9月），頁52-56。（DOI：10.29458/AGSCLSU.201207.0021）

江玉祥：〈論彝族民間傳說和故事中的孟獲形象〉，《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1卷（2000年8月），頁62-67。（DOI：10.6231/CME.2003(14)01）

何兆華：〈人觀、歷史與服飾：導論〉，《民俗曲藝》第216期（2022年6月），頁1-26。（DOI：10.30157/JCRTE.201006.0001）

吳依凡：〈真實與虛構：「諸葛亮南征南中」由《三國志》到《三國演義》承衍研究〉，《輔大中研所學刊》第21期（2009年4月），頁67-88。（DOI：10.29444/JGICLDFJCU.200904.0004）

李斌：〈《火龍經》考辨〉，《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1期（2022年2月），頁33-38。（DOI：10.978.75228/03876）

林圭偵：〈不存在的邊地婦女〉，《婦研縱橫》第112期（2020年4月），頁

54-63。(DOI: 10.6256/FWGS.202004\_(112).07)

林繼富、黃紫壇：〈諸葛亮傳說的記憶譜系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基於西南視角〉，《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第 17 卷第 5 期（2005 年 5 月），頁 13-25、153。(DOI: 10.62662/llyj0104001)

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婚禮記》中的禮學世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9 期（2006 年 9 月），頁 47-83。(DOI: 10.6351/BICLP.200609.0047)

梅錚錚：〈論孟獲族屬及諸葛亮南征意義〉，《看歷史》2023 年第 5 期（2023 年 10 月），頁 26-33。(DOI: 10.6435/SHM.197310.0343)

符麗平：〈《三國演義》「七擒孟獲」情節源流考〉，《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1 期（2015 年 1 月），頁 39-44；後收於符麗平：《從三國史到《三國演義》》（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 年），頁 209-219。

陳慶英：〈元代朵思麻宣慰司的設置年代和名稱〉，《中國藏學》1997 年第 3 期（1997 年 8 月），頁 45-50。(DOI: 10.6437/EM.198709.0018)

傅光宇：〈諸葛亮南征傳說及其在緬甸的流播〉，《民俗藝術研究》1995 年第 5 期（1995 年 10 月），頁 16-24。(DOI: 10.30382/SSA.202102\_(166).0002)

黃郁庭：〈蜀漢滅亡原因新探——以民族政策與地域衝突為中心〉，《東吳歷史學報》第 32 期（2014 年 12 月），頁 65-114。(DOI: 10.29457/SJH.200512.0001)

黃開華：〈明代土司制度設施與西南開發〉，收於余貽澤等著：《明代土司制度》，（臺北：學生書局，1968 年），頁 27-217。

劉方旭：〈民俗文化與民間記憶——重讀孟獲〉，《興義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13 年第 5 期（2013 年 10 月），頁 36-39。(DOI: 10.7044/JNHCTC.200406.0486)

劉海燕：〈《三國志演義》「七擒孟獲」故事的文本演變與文本批評〉，《明清小說研究》2015 年第 1 期（2015 年 1 月），頁 155-173。(DOI:

10.6814/THE.NCCU.CHI.008.2018.A08)

鄧琇文、鄭德輝：〈「竹淬」－以竹工藝應用於鎧甲造型創作之研究〉，《弘光學報》第 84 期（2019 年 9 月），頁 57-79。（DOI：10.6615/HAR.201909\_(84).0005）

鄭誠：〈中國火器史研究二題：《火龍經》與火藥匠〉，《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35 卷第 4 期（2016 年 12 月），頁 439-450。（DOI：10.3724/SP.J.7102771783）

# **The Imagina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Southern Barbarians” in Three Kingdoms Narratives betwee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seih, Yu-Te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 **Abstract**

Meng Huo as a figure and the “Southern Barbarians” (Nanman) as a people function, in Three Kingdoms narratives from the Yuan dynasty onward, as representative “non-Han” others distinct from the Han Chinese. Although Meng Huo can be found in historical records, both his portrayal and the collective image of the Nanman in works such as *Sanguozhi Pinghua* and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differ markedly from their historical counterparts.

The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constitutes a crucial means by which a community constructs self-identity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a and Yi (civilized versus barbarian) has been a central concern in Chinese thought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this conceptual framework gained particular prominence within Han Chinese culture following repeated invasions and periods of foreign rule, attracting heightened attention across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By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variations in the depiction of “othered” peoples

in Three Kingdoms narratives across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and by comparing these portrayals with the Ming dynasty’s institutionalized image of the *tusi* (native chieftain),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creators and audienc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received and imagined the concept of “ethnicity.”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effects and functions produced when elements from different periods are incorporated into narrative structures.

**Keywords:** Three Kingdoms, Meng Huo, Southern Barbarians (Nanman), Otherness, *Tusi* (Native Chieftains)

